

巴史新考續編

董其祥著
重庆出版社



巴史新考续编

董其祥 著

本书编委会编

重 庆 出 版 社

1993年·重庆

(川) 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夏树人
封面设计 张朝秋
技术设计 聂丹英

董 其 祥 著
巴史新考续编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重 庆 市 两 江 印 刷 厂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35千
1993年1月第一版 1993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

ISBN 7-5366-

定价: 4.50元

主编：孟广涵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川平、刘豫川、陈丽琼、孟广涵、周永林、
杨光彦、管维良、黎小龙

编辑：吴 艺、蒋 黎

前 言

孟 广 涵

董其祥同志(1924—1991年)，四川乐山人，是我省杰出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物博物馆专家，四川省历史学会顾问、重庆历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共产党党员。194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史地系。曾受业于著名历史学家与古文字学家徐中舒、考古学与人类学家冯汉骥、西南民族史与地方史专家邓少琴先生。解放初入西南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研究西南民族史。四川大学中国边疆研究学会成立后，即任《西方日报》、《工商导报》特辟《中国边疆》专栏主编，撰写关于秦汉至明清地方志所载西南民族史的文章，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学术生涯。

1951年董其祥同志因文博事业发展需要和良师的教导，来重庆参与筹建西南博物院(重庆市博物馆的前身)。1952年参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考古业务骨干。此后，他在重庆市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副馆长任职中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为发展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亲手征集、鉴选与登记编目的文物数万件，主持大中型陈列上百次，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史、近现

代史和中共党史，以及历代工艺美术、民族、民俗文物等。在繁冗的行政与业务工作中，仍挤出时间从事文物考古、民族调查等工作。除此之外，他生活的最大乐趣是读书。总之，他胸中蕴藏着对人类文明与祖国文化深沉的热爱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董其祥同志说：“博物馆工作者搞历史研究，要强调对实物的研究，要从实物到文献。王国维有‘二重证’即实物与文献并重。我认为是实物、文献、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并重，即‘三重证’，考古调查是基础。否则，很可能是空中楼阁。”这种治学方法在他科学研究生涯中一贯如是，对文博界尤其是青年人有着良好的影响和指导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弥补十年浩劫后继乏人的断裂，为拓宽研究天地，他带领中、青年进行了嘉陵江南充河段、长江重庆河段的文物考古调查；还进行了滇西北、沿海与北方民族考古及石窟艺术调查。1987年，他年逾花甲，还亲自领队并主持了重庆地区全面的文物普查。他结合工作与研究所得，先后写出专著《巴史新考》、《重庆简史》，重要论文《鬲颈部族考》、《四川大石文化研究》、《巴蜀社会性质初探》、《巴渝舞源流考》、《四川地区铜鼓的分布及族属研究》、《伏羲女娲图像新释》等。

他习通文献典籍，又具有古文字学、训诂学、古地理学的深厚基础，尤重视考古学与文献学结合，治学严谨，运用资料广博，中外古今，稗官野史，神话传说，以至轶闻杂记，信手拈来，皆成佳证。本集中的《四川大石文化研究》、《伏羲女娲图像新释》即是其代表作。

董其祥同志在《巴史新考》中曾提出：“中国文化是多

源的，在古代，南方民族的文化与黄河流域的文化各不相同，它们都是我国古代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今后遵循批判继承的方针，在固有的文化基础上，创造出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正是我辈的责任。”可见他研究历史的目的极为明确。

董其祥同志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以上著述外，还对古代钱币、书画艺术、陶瓷艺术，以及近现代史等皆有论著。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他主编重庆文物志，编撰文物志条目50余万字待发刊。自70年代末以来，他还受聘于重庆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任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史学概论》、《博物馆学概论》等课程。他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受到师生们的尊敬。

为更好地保存和反映董其祥同志的学术成果，特编汇此文集，以彰其学业、风范，启迪后学，这也是对他永恒的怀念。

1991年2月

目 录

前言	孟广涵 (1)
伏羲女娲图像新释	(1)
颛顼部族考	(35)
四川大石文化研究	(59)
巴蜀社会性质初探	(81)
巴蜀钱币试探	(113)
巴渝舞源流考	(141)
汉代四川铁钱考	(160)
四川地区铜鼓的分布及其族属研究	(170)
秘色瓷考辨兼论蜀窑秘色瓷	(186)
彭大雅事迹考辨	(199)
四川农民革命政权铸造钱币考	(214)
明夏货币研究	(228)
明夏睿陵“玄宫之碑”的研究	(233)
重庆古城考	(245)
郭沫若在重庆的考古研究	(252)
重庆简史	(274)
董其祥先生主要论著年表	管维良 编 (334)
后记	(341)

伏羲女娲图像新释

伏羲女娲石刻图像，前人已有著录和研究^①；但因时代所限，依据的材料不多，还有未竟之义，尚待疏证。笔者依据近年考古新发现的资料，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对此图像的社会历史意义及其族属问题，提供一些不成熟的认识和意见，以供学术界同仁参考，並希指正。

一、伏羲女娲图像的发现和著录

伏羲女娲图像的发现，早在宋世的金石书中即有著录^②。随着近代考古事业的发展，出土的图像特别多，现就其不同的质地，分别著录于后：

（一） 石刻图像类。此类数量最多。

（1） 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中的第一石，即有人首蛇身，两尾相交，手执规矩，中挟一小儿的图像。左柱有隶书榜题云：“伏羲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缕绳，以理海内”¹⁶字当为伏羲图像无疑。又后石五、左石四俱有人首蛇身交尾像。左石四刻画一人执矩向右，一妇人执规向左，两尾纠缠交结，中有两小儿亦作人首蛇身交尾状；左右各有人首蛇身

图像巨伏于前。此图像虽无榜题，但仍为伏羲女娲图像无疑。

(2) 山东沂南石刻画像。石室墓门东侧支柱上，刻绘伏羲女娲图像。人首蛇身交尾状，手执矩、执钺。中有一神人左右拥抱伏羲女娲，似为之撮合之状。象征古代天神（传为太一神）将男女结合以造人类的原始思想^③。

(3) 山东费县南武阳东阙画像。画一戴华冠的人端坐，伏羲女娲分刊两旁。此人一马挽女娲的蛇躯，一手抱伏羲的鳞身，使祠结合。其意又同前。

(4) 山东滕县、曲阜等地都有人首蛇身石刻图像发现，有的见于著录，有的尚未发表。1950年傅惜华主编《汉代画像全集》二编中9、24、25、72、158、159等图，都是伏羲女娲图像，可供研究参考。

(5) 河南南阳石刻图像。前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印《南阳汉画像石刻汇存》一书，收集颇富。其中第14图、第53至62图均为人首蛇身像。第63图为人首蛇身交尾像，第68图为人首蛇身对立像，下一巨人承之。第3图为人首蛇身捧月轮像。图上身着襦衫，下身为蜥蜴蛇尾委曲蜿蜒状。1985年文物出版社《南阳汉代画像石》一书，收录伏羲女娲图像达25幅之多，形态各异，图像清晰，极便研究者参考。

(6) 近世以来，四川出土此类图像特多。成都附近有：新津堡子山崖墓出土汉石棺画像，伏羲女娲图像作长袖欲舞之态，人首蛇身，手举日月轮，日轮中有金鸟，月轮图像不辨，有识为蟾蜍，有说为桂树。姿态极为生动^④。又同地又一棺画像，刻绘伏羲女娲图像与上图相似，唯身有双翼，躯体鳞甲宛然可辨。

(7) 郫县出土东汉石棺一具。后当上刻伏羲女娲图像。右为伏羲，左手举日轮，左为女娲，右手举月轮，日月轮内各有金鸟、蟾蜍图像。人首蛇身，双尾回环交结，有纠缠不解之意。新都天迴镇东汉崖墓出土石棺一具，棺壁刻有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像，手举日月轮之间，还有一圆轮，为他处所未定。

(8) 重庆江北盘溪无铭阙图像。右阙左侧刻伏羲手捧日轮，日中有骏鸟；左阙右侧刻女娲手捧月轮，月中有蟾蜍。右阙早年崩坍，残阙存重庆市博物馆。

(9) 去盘溪石阙不远的苏家院子后山坡上，在抗战期中出土砖室墓一坐。墓室后壁嵌有石刻画像一方，刻双阙及伏羲女娲图像。人首蛇身，双手举日月轮，下半身呈蜥蜴状。图像中间有一小儿作跳舞姿态，颇似家人团聚的情趣。

(10) 重庆沙坪坝，1938年原中央大学开辟农场。掘得石棺二具。同出有元兴二年（公元106年）五月丙午纪年铜镜一枚，石棺后当各刻人首蛇身像，一像手捧日轮，中有金鸟，一手持矩。另一像手捧月轮，中有蟾蜍，一手持规。两棺同出一墓，似为夫妇同穴异棺之葬。伏羲女娲分别刻于两棺，象征夫妇和合，化生万物之意。石棺后归中央博物院保存。据说该院迁回南京时，因石棺沉重，未能搬走，埋在原川东师范院内（即今文化宫）^⑤。

(11) 建国之初，沙坪坝重庆联合中学（即市一中）校北发现石棺一具，由重庆市博物馆运回陈列。棺的后当刻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举日月轮图像。前和刻双阙。右侧墓主人出行图，安车而行，前有导骑，后有随从。左侧刻主人归庄图，楼阁高耸，主人蹒跚归来，后随卫士及担鱼肉杂役人

等，表示了汉代地主阶级的闲居生活。

(12) 四川合川濮王墓，1972年发掘，出土画像石多幅。其中墓室右门门柱上刻画人首蛇身手举日轮图像。下身只略具粗胚，尾部迂回卷曲，仍为伏羲像。左门柱朴素无纹，似为未完之作。亦或只刻伏羲，不刻女娲；亦有只刻女娲，不刻伏羲之墓，用以表示墓主人的性别。此墓在文革中为当地农民拆毁。

(13) 四川江津石坎崖墓群。其中有一墓在其门框左侧浮雕人首蛇身手举月轮女娲像；但未见伏羲像。可能此墓主人为女性。

(14) 大足双墙乡崖墓群，其中一墓有石函二具（连基岩而凿者为石“函”）。函上刻房屋图案和乐伎人物图像。分别刻有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像。

(15) 四川合江城外出土熹平二年（公元173年）墓；有石棺一具。棺已残破。后当尚存四腿两尾相交的伏羲女娲下半身图像。其余部分已残缺不可知。

(16) 四川宜宾出土石棺一具，后当刻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像，图右伏羲梳高髻，左手托日，右手执规。图左女娲亦梳高髻，右手举月，左手执矩，人首蛇身相对而立。

(17) 四川长宁崖墓门框上，左右分别刻伏羲、女娲图像，手捧日月轮，轮上刻金乌蟾蜍^⑥

(18) 四川乐山岩墓，刻有人首蛇身女娲像。

(19) 四川简阳鬼头山，1988年出土石棺一具，棺的后当刻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像，并有榜题“伏希”。这与应劭《风俗通》：“女娲，伏希之妹，所记相同，弥足珍贵。棺之前和刻双阙，榜题“天门”这对汉代石阙命名为“门”得一佐

证。

(20) 四川芦山县，1942年出土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王暉墓石棺，前和刻墓铭题辞，侧刻半开门人首蛇身像一。上身衣冠楚楚，冠服有似汉人。下截鳞身，拖尾于后，仍是女娲图像。

(21) — (25) 四川璧山县，1987年至1988年间，出土画像石棺八具。其中五具具有石刻画像，已两度在文物普查展览中展出，正式对外开放。还有三具尚未整理。现就已展出的五具石刻图像中的伏羲女娲像，分别编号著录于后。

(21) 号图像(图1)。为石棺侧壁，壁面分为长方形框栏。右方栏内浮雕人首蛇身带翼女娲像，头疏椎髻，右手举月轮，左手执规状物，尾向右后拖。左方栏内，浮雕人首蛇身带翼伏羲像，头着平顶巾，右手举日轮，左手执矩，尾向右后拖，不作交尾状。

(22) 号图像(图2)。为石棺侧壁。壁面仍分为长方形框栏。右方栏内。浮雕人首蛇身戴翼伏羲像。头着平顶冠，右手持日轮，左手执剑，尾向右后拖。右前一人执扇，似作前导状。左方栏内。浮雕人首蛇身带翼女娲像，右手举月轮，左手执剑，尾向右后拖。右前一人执戟，作护卫状，这是《山海经》中所说“大行伯”，或为“门亭长”之类的图像。

(23) 号图像(图3)。为石棺侧壁。壁面用锯齿、连珠、黑边三层纹饰分为二长方形框栏。右方栏内，浮雕人首蛇身带翼女娲像，头梳双髻，左手持月轮。右手执半圆形规状物。尾委曲修长，身形窈窕有动感。左前方一侍女恭立。左方栏内，左边浮雕人首蛇身带翼伏羲像，头着山字形冠，

尾曲折一垂。右手举日轮，左手执一十字形节状物（仍是矩之变形）。右前方有三人。一人头着山形冠，手捧一物，回顾其后二女侍，捧“玉胜”之类法物，作奉献状。伏羲女娲图像虽分隔两栏，但互有照应。伏羲向右，女娲面左，情态生动有现实感。

（24）号图像（图4）。为右棺的侧壁。用双粗黑边夹钱纹边栏分隔壁面为三柱两间幅面。柱头作栌斗形。右方栏内，浮雕人首蛇身带翼伏羲像，头着山形冠，左手举日轮，右手执一弯状物，或仍为规。尾修长左拖。左前一人执扇前导。左方栏内，浮雕人首蛇身带翼女娲像，右手举月轮，左手执一规形物，头尖椎髻，尾修长右拖。前有一人持矛侍立应为“门享长”像。

（25）号图像（图5）。为石棺后当。有粗黑边栏，栏内浮雕男女两人像。上身着襦衫，下身裸露。头着山形冠。男女下身荫蔽处，各刻巨头细颈蛇一条，蛇尾相交。右首为伏羲，左手持日轮；右为女娲，右手执月轮，伏羲女娲两手互相牵引，状似亲密。此图像构图别致，具体生动，形象地描绘初民异性相引，生殖崇拜的历史遗俗，是一件极为难得的民俗资料。

（二）画像砖类

伏羲女娲图像，除见于石刻图像外，在四川地区，还见于特有的图像砖图像中。

（1）新都堡子山在出石刻画像的同时，又出画像砖一方，刻绘人首蛇身捧日轮像。冠三尖上出，应为伏羲像。惜墓为盗所发，遗物运到成都出售，为重庆江鹤笙所得，但不

知有女娲图像否。后江转让某大学博物馆，也不知原物还存否？

(2) 1954年成都扬子山出土汉代画像砖中，有一方原定名为“日神画像砖”^⑦，似为误订。图像为一人首蛇身，右手举日轮，中有“踰鸟”，左手持物不辨。胸腹以下蛇身，委婉盘旋，应为伏羲像。由于该砖为残墓所获，可能女娲像早年为盗所毁，殊为可惜。

(3) 崇庆出土伏羲女娲画像砖。图像为人首蛇身。伏羲右手执规，左手举日轮，其中有鸟。女娲梳双髻云鬟，戴耳珰，女性特征明显。右手举月轮，左手执矩。月轮中有蟾蜍桂树，图像清晰可辨。

(4) 彭县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砖。图像人首蛇身，尾作交结状。下有双龙蟠结，两首相向欲吻，似有异性相感之意。

(5) 重庆江北区盘溪612纺织厂库房后，因平地基出土东汉残墓一座。墓砖为矩形花边砖和子母榫券拱砖。花边纹饰作阳纹伏羲女娲图像，头着山形冠，人首蛇身，两尾相交。惜当年未采集收藏，不知遗物尚有存否？

(三) 其他质类

除以上所述石刻、画像砖图像外，还有绢帛绘画、陶塑、铜铸的人首蛇身像，也属伏羲、女娲图其之列。因附于此，以备参考。

(1) 1971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帛画一幅。其上部左右两隅有日月图像，其下各绘巨龙一条蟠绕。中有一人首蛇身戴冠服襦的神像，论者订为“东皇太一”神。双龙应

为伏羲女娲的雏形，尚保存了图腾物象的遗意。帛画中部，亦有双龙连环交结，延绵不解，仍有以龙蛇为图腾的迹象。

(2) 绢帛绘画的伏羲女娲图像，在新疆地区的考古中常有发现。据常任侠先生说：

“我国新疆以及中央亚细亚古墓中，亦常发现。日人橘瑞超氏，发掘新疆高昌古墓，曾获人首蛇身交尾画像，惟发掘情况未有报告，画藏旅顺博物馆中。其后英国派遣中央亚细亚探险队斯坦因氏，继续发掘高昌古墓，亦获此画。1928年所出版之《中央亚细亚》中，曾刊印之。据斯氏所记，墓中槨壁之上，常有绘画；在其奥壁，悬有绢织品，上画人首蛇身像。又棺上每覆木绵与绢织片，绢片所绘，亦人首蛇身像也。绢画为彩色，两人蛇身，绸缪相结，左者左执矩，右者右手执钺，上有日轮，卫星环之，列宿星斗，绕其四周。其后西北科学考察团黄文弼氏，亦获此类画像。得其函告，云亦类此。”^③

黄文弼所得，已发表于《吐鲁番考古记》^④中。由于西北地区气候干燥，丝绵织品所绘的图像易于保存，故考古所获甚多。反之内地，因潮湿霉烂，纤维织品保存不易，故伏羲女娲绢帛图像不见流传，因此并不能说魏晋以后绘此图像的风俗就绝迹于世了。而铜铸陶塑的此类图像，仍偶有发现。

(3) 陶塑伏羲女娲像，在唐宋墓葬明器中时有发现。五代南唐二陵出土陶俑中，有人首蛇身俯地俑，俑头人形，两首分向左右。头以下虬缠绕，鳞甲宛然可辨。四川地区出土的宋三彩俑，也时有此类陶塑发现。广汉宋墓所出的三彩

伏地俑，虽不作蛇身交结伏，但两首分向左右，仍属此类图像。

(4) 铜铸双头蛇身薰炉。早年得于南京古玩肆中。据售者云为南唐陵墓中遗物。双首并列，颈下合体，腰部中空出窍。遍体花纹斑斓，似非后世伪作。此为铜铸伏羲女娲像之仅见者。

以上所述伏羲、女娲图像之传世品件。就质地言，有石刻、砖瓦、绢帛、陶塑、铜铸五类。就时代言，上起战国，盛于东汉，衰于南北朝，止于宋代。就分布地域而言，四川、河南所出最多，山东次之，魏晋以后，传至新疆边远地区，渐渐衰歇。以实物论证历史，复原历史本来面目，先作情况介绍，无疑是很必要的。

二、古文献中关于伏羲、女娲图像的记载

关于伏羲、女娲故事的一般记载，本文不作全面介绍和研究。本文只就其图像的有关记载，加以征引考释，以供参考。

(一) 楚先王公祠庙所绘的图像

《楚辞·天问》王逸《章句》云：“《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僬僬，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所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懣，舒泻愁思。”